

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

——以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为例

谢燕清*

摘 要：孙本文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长期主政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对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评聘、学生培养都施加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孙在努力促使课程、师资标准化和多样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让中大社会学系染上他个人的色彩，这使得中大社会学系重理论轻实际的系风在其任内很难改正。

关键词：孙本文 中国社会学 国立中央大学

一切历史都是当下的历史，学术史选题也跳不出这条咒语。以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三个人为例，研究费的文章数量分别是孙、吴的 100 倍和 15 倍，而吴的数量又是孙的近 7 倍（见图 1）。学术关注度和人物在学术史上的真实地位并不一定相应，在 1949 年前的中国社会学史里，孙本文是一座不可忽视的山峰。

有关孙本文的研究，从其代表作或著述体系着手，基本评价是著述丰富、体系庞大、自成一家，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独到贡献。^① 孙本文在学

* 谢燕清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xieyanqing@nju.edu.cn）。

① 这些研究分别参见，陈树德（1984），徐妙发（1984），陈定阔（2001a：103~115），韩明谟（1987：118~129），刘洪英（1998），欧阳湘（1999），郑杭生、李迎生（1999）杨雅彬（2001：395~509，884~958），鞠春彦（2008），胡炼刚（2010），AU-YEUNG（2000），孙世光（2001），陈定阔（2012：179~264）。另在 1979 年后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发表的文章，多用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 1949 年前学者的学术地位和正确性，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末逐渐得到矫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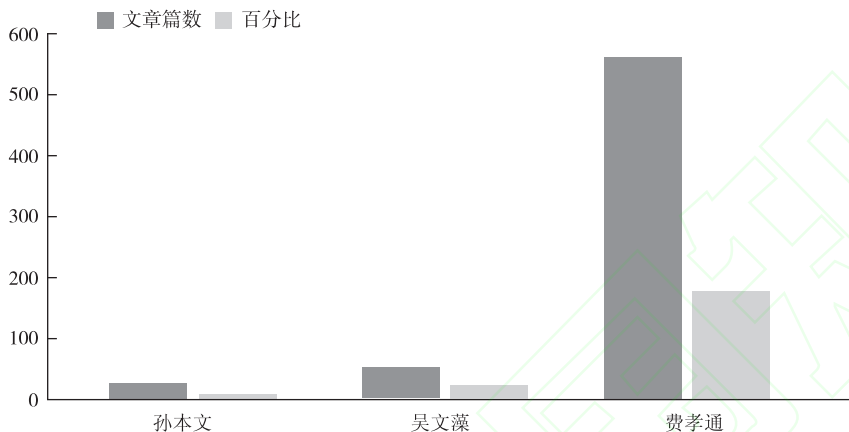


图1 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相关研究文章篇数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kni）（1979~2012）。

术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做”故我在。他还是学术社团的组织和参与者、学术刊物的主持和编辑、学术丛书的主编、大学系科的负责人、政府相关部门的专业技术官员等，仅局限于思想史的研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和管理者，他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影响远比作为教授要复杂得多。

已有研究基于正式出版文献或者亲历者的回忆录，集中讨论孙本文的学术思想贡献。本研究基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资料体现了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课程、师资等周期性变化的特点，内容主要是孙本文作为教授和系主任在中央大学期间的活动，从而和上述论述形成佐证，据此讨论孙本文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具体贡献，至于未记录在档的活动，则不在讨论范围内。

一 如日中天——孙本文在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地位

孙本文之受推重，与他的社会关系和人生履历有关系。其人生中两个起始点非常关键，一是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专业，二是1920年考取公费留学，于次年赴美留学（明强，2001：9，11，13）。学成归国后，孙在上海经历了短暂的历练很快崭露头角。此时恰逢南京政权建立，一所立志超越旧大学（北京大学）的新大学（中央大学）诞生了，孙本文1929年进入中大社会学系，其学术生涯从此随着新民族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

孙本文 1949 年前的社会学职业生涯，除了在复旦大学的两年半，其余时间都在中央大学。要想说明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得说清楚他在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地位和作用。中大社会学系经历了文学院时期（1928～1935）和法学院时期（1941～1949），社会学系 1927 年成立于社会科学院，1928 年改隶文学院。文学院时期社会学系颇为动荡，一是人事关系变动频繁，前后有五位系主任，分别为萧纯锦、龚贤明、孙本文、王际昌、黄文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139：211～222；648/1138：149～150；648/1127：349～350；648/1141：20～25；648/1472：84～86；648/1144；648/1146：58～61）；^①二是地位不稳，不到八年两次遭到存废危机。^②法学院时期相对平静，只有李泰华和孙本文两位系主任^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164：23；648/1173：13）。

从文学院时期学生的回忆文章里只看到学生对老师的仰慕之情（陈定闳，2001b：37～46；郭骥，2001：58～63）。但从档案里我们看到，首任系主任萧纯锦是经济学教授，显然是过渡性人物；孙本文从上海复旦来是接替龚贤明的，然而他没多久兼管（教育）部务，去了高教司，旋即王际昌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从档案里留存的几封信件我们大体可以复原中大社会学系早期一起长达一个学期的师生教学纠纷事件。从学生写给校长的信，我们得知孙本文以在教育部兼职为由，推荐王际昌代理系务，但王际昌拒不接手，面临学期交接，事情等待不得，学生呼吁孙先生回来“上岗”云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820：6～7）。

孙本文则以身体不好搪塞教务主任，在给校长的信里透露出真实原因，即到任后恰逢“系中纠纷极盛之时”，孙调和了一个学期，学期末“本学生会又提出对于诸教授之所谓总意见书，指摘吹求，无微不至”。而

-
- ① 该注释依次表示资料来源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 表示全宗号，1139 为案卷号，其后为页码。以下档案资料均按此方式标注。
- ② 关于中央大学社会学 1932 年和 1936 年两次存废问题，欧阳志英（AU-YEUNG，2000：73～91）有一个相对周全的考察和解释，其要点是基于民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立场倾向，由于一些具体的偶发事件和当事人的立场和观点，中大社会学系成为政府教育政策调整的牺牲品。由此推论，民国时期体制内的社会学命运主要还是决定于政府内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系力量对比。
- ③ 1942 年的教员登记表里，李泰华是系主任，而孙本文是师范学院院长兼社会资料室主任，这可能是学校之下的一个机构，在校—院—系的结构中，资料室与会计室等机构和院是平行的，当时顾颉刚任出版部主任。李泰华是否到任值得存疑，相关登记显示系里没有其他教职员，或许他是一个纸面上的系主任。

孙本文“既未能完全不顾学生之争求，又未能不忍诸教授无端受屈而去”。因此，“处此进退维谷之境，惟有引咎离校以慰良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820：49~51）。他去教育部里兼职未必没有暂离是非之地的意思。

从校长张乃燕和教务长的慰留信中我们看到，孙本文在这件事采取的态度是以退为进。教务长建议，“窃以孙主任辞意既允取消准，似可尊重其意，准予请假。至于王际昌先生学识经验均极丰富，兼代系务学生亦表欢迎。业与文学院汪代院长及王先生本人分途商洽，均示同意此事，似可照办，以免系务停顿。惟王先生副教授薪金原为月支二百六十元，兹如准其兼代系务，在其兼代期间，可否准支系主任薪金以资酬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827：2~4）。他的方案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面子和里子，可谓老成谋国。经过校方的挽留，孙接受了“休假半年”、由王际昌代理系主任的方案。由此可见孙是校方心目中社会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827：47~48，286~287），王际昌有没有接任尚待考，但孙本文将自己的同好黄文山引进做了系主任倒是事实。

试比较文学院和法学院时期的人事关系就可以发现孙本文的影响力在前后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同之处是孙本文都是系里影响最大的教授，但在法学院时期孙的影响力又有了一个飞跃。万国雄（2001：48）是法学院时期的学生，他回忆学生们都称孙为“系老板”。这足以说明孙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还有其他的例证。

第一就两个时期而言，人事关系有本质的变化，文学院时期前后经历五位系主任，而法学院时期据档案可查有两位，孙本文自1943年正式接掌社会学系主任后就再没有相关人事变动。同时经过撤系后，孙本文成为中央大学唯一留任的社会学教授，文学院时期的教授星散各地，专任教员无一留任。除孙之外，法学院时期的专任教员无一是文学院时期，这对话语权有着微妙的影响力。

第二就学历和资历而言，孙本文都是两个时期最过硬的。文学院时期，系里的专任教员都有留学背景，但基本没有博士学位，年纪比孙小不到4~5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539：11）。法学院时期，专任教授留洋博士增加了几位，年龄与孙普遍差距在10岁以上。5年和10年，前者是师兄弟的关系，后者则是一代人的关系。在法学院时期，专任教授8人，正教授里有一人是孙在复旦时期的学生，副教授两人都是孙在中大的学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202：51~52；1203：125~127）。

第三个证据是法学院有两种奖学金，其一是“社会学系奖学金”，是

毕业同学为纪念该系成立 20 周年及孙本文执教 20 周年而设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756）。可见时人已经将中大社会学系和孙本文等量齐观，这是中国文化所说德望的体现。

由档案资料我们进一步得知，孙本文在中大社会学系的地位塑造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中大社会学系受聘人员资历均不如孙本文；其次，1936~1941 年的社会学系停办拉大了孙和同事之间资历的差距；最后，王际昌兼任系主任事件说明孙对中大社会学系的掌控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学术成就不等于系务影响力，同样资历也不是一下就能转为控制力，对于孙本文而言，时间很重要，特别是停办社会学系的空档期使得他在中大社会学系的地位更加突兀。

二 勤于耕作——中大社会学课程、专业设置

中大社会学的课程建设分为文学院时期和法学院时期，文学院时期的课程设置大体和当时中国社会学课程规范化进程同步，经历了一个摸索、积累到完备的过程，而法学院时期课程设置则是相对完备和稳定的时期。

在孙本文来中大之前，社会学系共开 25 门课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822），朱亦松开设九门，龚贤明开设六门，游嘉德开设三门。龚、朱是专任教员，两人开课占了总数的 83%，这和民国时期教员的专任、兼任制度有关，在人数少和课程设置不规范的情况下，个人偏好影响尤为突出。

中大社会学推出了自己的学科建设计划，“本系教课方向向来偏重于社会理论及问题的研究”，这个自我评价和反思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孙本文的治学特点。中大社会学系计划在民国十九年（1930）春，增设社会工作和人类学两门专业，到民国二十年（1931）秋季，社会学系调整为三个专业，即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专任教员比例为 6:3:3，课程数目比例为 40:15:15。^①

但这只是设想，具体以民国十九年（1930）的课程设置为例，社会学系分理论社会学组和应用社会学组，分别对应规划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组课程分化不大，以专业课为例，各开 29 门专业课，合上的有 16 门，而选修课大体上将甲方的专业课设置为乙方的选修课，如此一来，两

^①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1930），第 17~18 页。另社会学专业增设两名助教。

个专业学生总的修课差异不大。^① 师资匮乏是专业课分化不明显的主因，文学院初期系内的教学矛盾也与此有关。文学院时期社会学系专任教授编制始终维持在3人的规模，上述计划只是一纸蓝图。

即便如此，孙本文和他的同事们在课程建设方面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孙在向校方谈到社会学系课程建设成就时提到“课程自四门增至十二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6253：48~53），其时正值第一次社会学系存废危机（1932），他没解释这些课程是必修课还是指专任教授所开课程，但总是反映了课程数量的绝对增长。1934年，社会学系又提出了教学改革计划，提出教学目的有三：理论和实际并重、养成社会服务人才、注重中国社会文化研究；课程设置侧重年级差异的分化，一、二年级注重基础与工具科学，三、四年级注重社会学实际研究及调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3843：115~116）。虽然此时社会学系已经风雨飘摇，这些条陈显示经历若干年教学实践，孙本文及中大社会学系同仁对于专业教学已经有了相当感性和理性的积累。

法学院时期，中央大学已设立边政学系，随后人类学系又独立建制，开办人类学专业变得不现实，重建的社会学系包括社会学（理论组）和社会工作（行政组）两个专业。相比较文学院时期，课程有如下变化：一是进化论色彩明显的课程被称谓相对中性的课程取代，诸如“中国社会史”；二是本土化色彩的课程大幅增加，诸如“乡村建设与教育”“土地问题或土地经济学”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756）。专业培养的目的更加明确，社会学教学目的是强化理论素养，为研究生教育打基础；社工教学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引导学生就业。

民国十九年（1930）的规划里就提出要建研究所，到法学院时期才有条件付诸实践。1945年，孙本文致信中大校长顾毓琇，指出西南联大社会学部无法满足众多学生考研需求，而中大社会系师资和硬件设施尚可。当时大学院系和研究所的编制、经费分开，设立研究所将增加额外的资源。但后来废除了研究院，实行系所合一，即研究所是虚的，挂靠在系里，这可能和国民政府财政恶化有关。1947年，孙本文再提建所，由于不涉及编制和经费，很快理想变为现实，同年档案里就出现了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465：21~22）。用孙本文的话说，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区别在于“高深”。研究生社会学专业目的是培养大学师资，而社工则是培养高级社工和行政人才。从课程设置看，研究生阶段，社会学和社工专业基本不再共修

①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第73~79页。

课程。这是中大社会学系课程建设成熟的标志。^①

中大社会系的课程建设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课程的西化和本土化问题。课程西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民国时期社会学界以留洋学生为主体，其中又以留美生为主。有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社会学课程美国化倾向严重（陈新华，2009：143），中大社会学系课程亦不例外，但同时也有另一个面向即课程的本土化努力，前面课程设置调整已经指出这个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在民国时期学院派不承认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这是一项集体行为（陈新华，2009：106～107）；二是孙本文的确表示过学院派的社会学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6253：48～53）。

第三个问题是中大社会学系课程孙本文化。文学院后期，课程设置偏向文化方面，当时的主干教授孙本文和黄文山都是文化论者，这一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法学院时期孙本文孤峰独峙，课程设置更加体现了他个人的色彩。1948年的普通社会学^③，该课程一共有六门课共计18学分，分别从甲编到己，其中甲为孙本文授课，乙、丙为陈定因，丁、戊、己为高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252：41～42）。陈定因（2012：188）以孙本文衣钵弟子自居，其他学生也认同（万国雄，2001：51）。高植被孙本文选中自然也是知趣相投。当时中大专任教授有8人，孙、陈、高已近半壁。

第四个问题是本科生调查实习的问题。孙本文主政社会学系后，努力改变教学中重理论轻实际的状况。文学院十九年的规划里提出了若干方案，诸如为社工专业设立“唱经楼社会中心”，社会学专业设立“首都社会搜救所”，作为实习常设机构。由中大社会学系和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合办“土山镇农村社会实验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459：16～27），这是中大历史上最完善的一个实习计划，但学校以没有经费否决了。

① 由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的溃败，使得中国社会学战后蓄势待发的良好势头戛然而止，改革开放又是对极“左”政治势力的清算，社会学又获得了重建的机会，因此社会学发展与左右翼势力在中国博弈的关系值得关注。

② 孙本文反对当时一些刊物冒用“社会学”名义在社会上散布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混淆两者的关系。1949年以前由于政治原因，也的确有人借社会学名义传播“左”派乃至中共的社会和政治主张。

③ 普通社会学这个称谓，是给外系学生开课名称，本系学生开课时用社会学原理以示深浅差别（陈定因，2012：192）。

法学院时期，孙本文依然筹划建立调查实习基地。1944年，他向校方提出了重庆石桥铺社会服务试验区计划。他提出由中大单方面出资，使之成为中大的一个外设机构。相比较而言，石桥铺计划更多考虑的是学术要求，社会服务居于次要地位，而土桥镇计划则是将社会学调查服从于乡村建设。该计划得到学校和社会部的批准，并拨付了经费。1945年，孙本文又提出了中渡口方案。该方案是对石桥铺计划的修正，一是地点离中大更近；二是尽量用在编人员义务做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474：5~8，16~21，51~52，55~56，61，74~76）。中大迁回南京后又提出了玄武湖社会实习站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5590：151~155），从中大步行到玄武湖只需要半个小时。

由此可知，影响中大社会学系实习基地的决定性因素是经费，它造成了实习地点空间的萎缩和项目的简省。但还有其他社会调查形式可作为补充，一是去外地做短期参观，由本系助教带领学生去著名的社会实践地点（山东的邹平）参访。二是学生在假期自行组织去外地旅行考察，由系方开具证明或向校方申请经费补助，或向交通部门申请旅费减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351：70；648/2384：1~30，72~75）。至于毕业论文调查更是责无旁贷，介绍学生去相关部门搜集资料，诸如法院、教育局、社会局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380：177~185；648/2399：33~41）。

文学院时期，中大社会学系组织了贫儿调查、莫愁湖草棚住户调查、笆斗山游民调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3843：118~119）。1947年孙本文在南京时，领导学生从事南京工厂劳工、南京教员生活费用的调查，并于1948年与学生发表了《南京市的工厂劳工》《南京市五十个教员家庭生活费用之分析》等文（陈定閔，2012：211）。从教学和课程设置上看，孙本文对实地调查并没有偏废，之所以显得有些轻忽，是因为中大社会学系的传统以及孙本文本人的治学长项就是在理论综合方面，如果这成为一种过错似乎有些求全责备。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吴文藻-费孝通一脉的中国学派起了主导作用，在这个氛围下以该学派的特点评价中大教学或孙本文治学的得失显然有失公允。

三 以身作则——社会学系师生的管理

作为一个社会学系负责人，孙本文的角色势必牵涉更多的人事关系。孙本文的人格特质有以下几方面：宽厚、严正、勤奋、胆小（明强：2001：23；陈定閔，2001b：39；胡炼刚，2010：17；万国雄，2001：48）。

这些评价分别来自同事、学生和家属，由于视角不同显得有些错位和模糊，这正是人性复杂的真实体现。基于这些人格特质，社会学系日常管理中孙的为人处世才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看师资配备问题，中大社会学系从文学院时期就期待将专任教员的编制扩充到 12 人，但实际编制维持在 3 人的规模，到了法学院后期才达到 8 人的规模。除争取编制外，孙本文也充分考虑到师资背景的多元化。他曾表示希望系里的教授各国留学的背景都有，这样便于学生学习各国的社会学（陈定闳，2012：187）。文学院时期，教员都是留洋学生，法学院时期专任教员里出现了几位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员，这也算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一种成果体现。

孙本文的严正主要体现在对教学态度上，他是一个有“清教徒”色彩的人，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从不请假缺课，不占公家便宜，等等，因此学生对他的印象是严格而充满爱意的。档案馆现存一份社会学原理手稿^①，厚达 51 页，所列参考文献，英文有 21 种，中文有 61 种，遍及古今中外，很符合孙本文治学穷尽资料的特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308）。他通过检查学生笔记了解教学内容，在系务会议上批评某教授备课笔记太少（陈定闳，2012：190）。孙本文对讲义的重视可能与他初到中大社会学系时遭遇的师生冲突有关系。现仅存一份吴姓学生写给校长的信，矛盾集中在教材和教授质量问题。学生反映当时教授常自编授课笔记，即便有正式教材也是西文，阅读困难且内容脱离国情。由于方言口音问题，学生听不懂教授说什么。因此呼吁校方将教授的授课笔记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2459：1~10）。

孙本文对待同事素以忠厚著称，一般不当面驳斥。针对某教授耍手腕、搞小动作，孙多次在系务会上匿名批评。最后决定辞退该人，孙命学生陈定闳送聘书时捎话，希望对方主动辞职。后该人借口返回南京再辞职，此事遂不了了之。孙本文唯一比较果决的例子是任期内解聘了两个有家室而乱搞男女关系的教员，一个挑拨是非的助教（陈定闳，2012：181，191）。从这里我们看出孙本文的两面性，即是非明断和优柔寡断。亲属对他的评价是胆小，说孙先生日常生活中是退让隐忍，他和同事不会采取当面碰撞的方式，家属常常看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家。

中国的基层组织管理既依靠规章制度，更依靠管理者的人格特质和处事技巧。孙本文治系与其人格特质密不可分，他通过严于律己树立权威。

^① 手稿没有注明作者，可能是孙本文的讲课提纲。

首先是勤奋治学，民国期间实行教授治校，学术影响力奠定基本话语权，孙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次是认真教学，在学生印象里孙兼职甚多，但从请假、缺课，上课也从不扯闲篇，学生公认上他的课程收获多。再次是事必躬亲，陈定閔回忆孙从不让学生代劳。学生选课需系主任签名，也是亲自坐班一一签字。最后是淡泊名利，不拿红包，通胀时坚持专职教授的本分，不外出兼课。

系务会议是中大社会学系的管理方式之一，在系务会议上讨论教学质量问题，也讨论人际关系问题（小动作），还有教学行动计划，例如调查实习基地计划。教员的评聘是否在系务会议上讨论不得而知。孙本文打算辞退系里某教员，具体操作过程是派系里的同事（自己昔日学生）捎话，显然这是私下操作。如果系务会议公开决议，或者已经上报校方，就不会出现当事人用拖延战术将此事化解的结果。可见辞退与否主要取决于孙（系主任）与当事人具体的博弈，如果孙的决心大，就能办成。

系主任作为大学管理的中间层，行使用人权上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一般情况下校方不具体过问系内的人事任免。他们一方面依据学校的规章制度操作，一方面遵循专业标准、个人道德偏好等综合评判来选择教员。从前例可见，在孙心目中，已婚者乱搞男女关系是一个用人的底线，其他问题尚在权衡范围之内。如前述孙的另一个聘用的特点就是注重多元化背景。法学院时期，孙本文也进了两个文学院时期的弟子，有一定的学术传承安排意图。

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兼任教员聘任活动。以中大社会学系聘请金陵大学吴榆珍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48/1699：1，6，8），档案里有两份材料，一份是初聘吴为兼职副教授，报告由孙本文递交。但吴榆珍提出升等的要求，对此孙本文接受。于是有了第二份聘吴为兼职教授的报告，但申请人附上了法学院院长何联奎的名字。孙追加了一个附注，指出吴已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二年，“该院与本校地位略相等”，即吴的职称含金量与中大相同。尚未查到有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大学之间搞过什么排名，但从中大一些教授的履历看，不少教授来中大是高职低聘的。这里透露一个信息即当时大学之间有潜规则，某些大学是一个档次，其教授职称评聘具有同等性，金陵大学与中大虽是同等，但是否起作用还要看当事人的博弈。如果吴教授不抗争，那她就只能以低聘的方式来中大兼职。

四 多声部视角——档案的频道

科塔兹 (Cortazzi, 1999: 203 ~ 235) 引述戈夫曼 (Goffman) 的研究来说明关于个人的叙事是一个多角度和多层面的建构, 它和真实经验存在一定距离, 又保持一定联系。里斯曼 (Riessman: 1993) 也表示, 叙事是经验的再现, 叙事是解释性的, 但它们自身不能说明什么, 需要阐释。就孙本文而言, 我们可以将他视为一个叙事研究对象, 对一个已经故去的历史化的人物无法运用访谈方法, 但依然可以通过文献方法将他视为一个言说者和被言说者。

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把问题搞得过于细致琐碎, 现有关于孙本文的社会学文献和研究都着力于他的学术思想, 这诚然是一个学者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一个知识人 (兹纳涅茨基, 2000), 孙本文的社会角色并不是单纯的大学教授, 他还是学术体制内的一个行政负责人。孙本文案例呈现的是科塞 (2001) 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多面性, 反映在学术管理体制里, 他具有科层制人格的面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的资料主要是校方课程、学生、教员、设备等几大项内容的管理记录档案, 校方通过这几方面内容的陈述, 将中央大学的日常工作秩序呈现出来。制度化和秩序化的追求通过年复一年规范的表格填写得以强化, 宛如一架庞大的机器, 社会学系不过是一个可拆卸的部件。在档案里, 我们只看到在第一次危机 (1932) 时孙本文上书给校方提出了五条理由, 第二次危机 (1936) 则没有留下任何抗争的声音。

体制化的叙事尽量剔除个人的特征、情感, 抹平一切极端事件对系统造成的震荡。有迹象表明社会学系在文学院早期有一个学期的时间甚为混乱, 但档案里并无记载和说明, 通过几封存留的信件, 我们看到校方不关心系内的纠纷以及因果关系如何, 只要这种关系不扰动到整个系统即可, 校方最关心的是挽留住大牌教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档案里, 校方对系内的关系的描述有其独有的角度, 例如校方历年的人事登记表, 其排序反映该教员在校方心目中的重要性。而孙本文受聘于中大后, 一直占据登记表的第一位。

中大的档案里重复着两大主要内容, 一是每学期的教学内容安排, 二是围绕前者展开的师资评聘。孙本文的活动乃至其自身形象在这种叙事风格下显得毫无色彩可言, 因为在档案材料里, 孙本文的诉说对象主要是校方, 作为一个行动者或者说表演者, 他所展示的主要对象也是校方, 当然

还有学生和同事，但校方记录里更重视的是他和校方有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涉及校方的管理。因为这种叙事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人物变形我们将另文讨论。

简言之，孙本文在中大社会学系的地位以文学院时期结束为分水岭，到法学院时期时他已奠定了“系老板”的地位。其学科的贡献体现在课程建设上，尽管孙本文在文学院初期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计划，但受编制的局限，当时开课一直比较局促，这种情况到了法学院时期有所改观，不过此时课程里孙本文文化的色彩有所呈现。影响中大社会学系调查实习地最大的因素是经费，而中大调查风格以定量方法为主。从档案里看，文学院时期的人员变动较大，而法学院时期，专任教员基本没有变化，这其中原因有待考察。档案直观地说明了中大社会学系与孙本文是如何形成的二而一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孙本文的高度决定了中大社会学系在中国社会学界的高度，这也是孙本文主政社会学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陈定阔，2001a/1984，《孙本文社会学理论体系简论》，载孙世光编《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1b/1989，《恩师百年颂——缅怀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孙本文教授》，载孙世光编《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2/1992，《孙本文研究》，载周晓虹主编《孙本文文集》（第十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树德，1984，《孙本文和“社会学原理”》，《读书》第3期。
- 陈新华，2009，《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郭骥，2001/1985，《孙本文老师的风范》，载孙世光编《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韩明谟，1987，《中国社会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胡炼刚，2010，《1949年以前孙本文的学术思想变迁——基于脉络和文本的分析》，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鞠春彦，2008，《孙本文社会建设思想评述》，武汉：《学习与实践》第8期。
- 科塞，2001，《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刘洪英，1998，《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
- 明强，2001，《孙本文先生评传》，载孙世光编《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欧阳湘, 1999, 《孙本文构建的中国理论社会学体系》, 《益阳师专学报》第 3 期。
- 孙世光 (编), 2001, 《开拓与集成: 社会学家孙本文》,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万国雄, 2001/1999, 《中国社会学系奠基人——孙本文博士》, 载孙世光编《开拓与集成: 社会学家孙本文》,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徐妙发, 1984, 《论孙本文在旧中国社会学界的作用和影响》, 《社会》第 1 期。
- 杨雅彬, 2001, 《近代中国社会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郑杭生、李迎生, 1999, 《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 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 《江苏社会科学》第 6 期。
- 兹涅涅茨基, 2000,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郑斌翔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中央大学法学院概况》(1934~19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756。
- 《国立中央大学章程一览》(19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822。
- 《中大教职员名册》(19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38。
- 《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名册》(1929~19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39。
- 《伪中大教职员名册》(19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41。
- 《伪中大教职员名册》(19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44。
- 《伪中大教职员名册》(19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46。
- 《中大及所属各院校名单》(194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64。
- 《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人员名册及兼任教员名单》(1942~19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173。
- 《伪中大教职员名册》(19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202。
- 《各院系教职员名册》(19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203。
- 《1948 年教职员名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252。
- 《文学院教史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职员聘书及应聘书》(19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472。
- 《中央大学教职员调派任免有关文件附中大各学院院长系科主任教授讲师助教一览》(19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593。
- 《中大聘吴瑜珍任教授》(19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699。
- 《中大法学院教职员任免及有关文件》(1939~194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820。
- 《中大文学院教职员任免》(1928~19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1827。
- 《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原理底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2308。
- 《有关学生参观实习考察游览事宜》(1945~19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648, 案卷号: 2351。
- 《文学院地理系外文系学生分赴东北沪杭等地考察》(1931~19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2380。

《社会学系、文学系学生赴外地参观请发津贴和购半价票邮件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2384。

《法学院学生参观实习及分派各地学生名单事宜》（1946～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2399。

《社会学系与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合办土山镇农村社会实验区等文书》（1933～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2465。

《研究院、所、学部设置计划和经费补助等问题》（1944～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2465。

《社会学系设置社会服务实验区的有关文书》（1944～19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2474。

《文学院文件留稿及工学院土木系1943年暑期毕业生名单》（19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3843。

《理、医、法三学院教学科研及仪器、设备添置等有关函件》（1941～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5590。

《文学院文件留稿》（19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6253。

AU-YEUNG Chi-ying（欧阳志英），2000，*The Academic Sociologists and the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Sun Benwe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硕士学位论文。

Cortazzi, Martin, 1999, "Sociological and Sociolinguistic Models of Narrativ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vol. III, ed. by Alan Bryman & Robert G. Burg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责任编辑：周晓虹）